

跨國華人社會的脈動

——近代潮州人的僑批局網絡探析（1911—1949）*

陳麗園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

提要

本文把近代東南亞華人社會與僑鄉社會視為一有機聯繫的跨國華人社會，並嘗試探討連接東南亞與華南兩地華人社會間的跨國橋樑如何建立。民國時期，潮州人僑匯和僑信的流通大部份通過僑批局網絡進行，僑匯和音訊來往無疑是跨國華人社會得以建立和維繫的命脈所在，因此，僑批局網絡的研究對剖析東南亞一華南華人社會跨國聯繫具有重要意義。立足於與檔案文獻和田野考察，本文揭示了在近代東南亞華人社會與潮汕僑鄉社會間廣泛存在的僑批局網絡，是由多個層次的地域網絡相互嵌合的體系，由於其經營結構與華人社會的社會經濟結構具有一致性，該網絡深入東南亞與華南兩地華人社會。通過家族網絡、合股關係和鄉族商業網絡等方式的有機結合，分佈於東南亞與潮汕地區的不同批局得以建立起相對穩定的聯網合作關係，從而構建了可以連接和滲透東南亞華人社會與華南僑鄉社會體內的社會經濟脈絡。

關鍵詞：跨國華人社會、僑批局、商業網絡、潮州人、僑匯

* 本文修改過程中得到業師劉宏教授、陳春聲教授及兩位匿名評審人寶貴的指點，謹致謝忱！

一、引言

海外華人社會與僑鄉的聯繫很早以來就受到學術界的重視，不過該項研究大部份都被分隔在海外華人研究與僑鄉研究的領域裡，雖然彼此的立足點不同，其旨趣大都在於證明海外華人對其家鄉的積極貢獻或僑鄉社會對華僑的依賴性。對華僑（華人）／僑鄉概念的二分法使用，使海外華人社會與僑鄉聯繫的研究擺脫不了影響與被影響的模式。在這種二分法的概念下，海外華人社會與僑鄉社會也顯得殘缺不全。近年來興起的華裔網絡與僑鄉聯繫（*qiaoxiang ties*）的研究對以上二分法有所突破¹，它們都注意到海外華人與僑鄉之間的內在聯繫，但由於其目的往往在於探討文化資本和亞洲型資本主義的命題²，故沒有導向對海外華人社會與僑鄉互動關係的探討。在跨國主義理論（*transnationalism*）影響下，有學者開始將海外華人社會與其家鄉視作一個具有內在聯繫的跨國華人社會，並出版了有關美國華人與四邑僑鄉關係研究的專著。³ 在以上研究的基礎上，本文把近代東南亞華人與僑鄉社會視為一有機聯繫的跨國華人社會，並嘗試探討連接東南亞與華南兩地華人社會間的跨國橋樑如何建立：究竟是怎樣的聯繫機制使在空間分佈上具有廣泛性和跨國性的東南亞華人社會與僑鄉社會聲息相通並融合為一有機整體？下文試圖通過對潮州人的僑批局網絡的探討來回答上述問題。

僑批簡稱「批」，它具有「批信」（僑信）和「批銀」（僑匯）的雙重意義。承擔僑批運轉工作的主要機構為僑批局，僑批局在不同的地方和時期有不同的名稱，如批信局、銀信局、僑信局、信局、匯兌局、匯兌信局、匯兌莊、僑批局、僑批館、批館、批局等，為行文方便，本文統稱為「僑批局」。在東南亞，僑批局從華僑手中收到僑批，然後通過國內的僑批局分發給僑眷，再從僑眷手裡收集回批（即回信或僑批收款憑證），通過東南亞的

1 參見Gary Hamilton, ed., *Business Network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1); Leo M. Douw, Cen Huang and Michael R. Godley eds., *Qiaoxiang Ties: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Cultural Capitalism" in South China* (London: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9); 劉宏，〈戰後新加坡華人社會的嬗變：本土情懷・區域網絡・全球視野〉（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3）。

2 廖赤陽，〈世紀之交的華僑、華人研究——尋求網絡與國家的對話〉（未刊文）。

3 Madeline Yuan-yin Hsu, *Dreaming of Gold, Dreaming of Home: Transnationalism and Mig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China, 1882–194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僑批局發回原寄批人，由是僑批的流通過程即告完成。建立在僑批流通的基礎上，僑批局與顧客（華僑／僑眷）、僑批局與僑批局間所形成的具有長期穩定性的關係結構，本文稱為僑批局網絡。其中僑批局與顧客間的關係網絡屬於僑批局的收發網絡，而僑批局相互間建立的關係網絡則屬於僑批局的組織網絡。在整個民國時期，潮州人僑匯和僑信的流通大部份是通過僑批局網絡進行的，而僑匯和音訊來往無疑是跨國華人社會得以建立和維繫的命脈所在。

本文研究的資料基礎主要有如下幾方面：首先是廣東省檔案館所藏有關潮汕僑批局的檔案。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為加強對民間信局的管制而實行的登記制度，使今天檔案館裡保存了僑批局登記的豐富檔案。本文主要利用以下檔案：汕頭市郵局檔案，全宗號86，目錄1，卷344，「中華民國25年各批局聲請書副份」；郵政管理局檔案，全宗號29，目錄2，卷370，「廣東郵區批信局已呈准設立之國外分號清表」（1948年11月23日）；卷371，「汕頭段三十五年份已掛號批信局詳情表」；卷374，「批信局國內外分號開設地點名稱一覽表」和卷382，「廣東郵區汕頭段各批信局聲請換發37年執照表」。其次，著名的民間僑批收藏家鄒金盛先生也在其豐富的僑批收藏基礎上，對每家僑批局作了詳細的考證，其研究主要見於《潮幫批信局》一書。最後，為開展本課題的研究，筆者於2003年9月至12月曾在泰國、馬來西亞和潮汕地區進行田野調查，搜集了豐富的文獻和口述資料。篇幅所限，本文主要討論以下問題：1、從僑批局與顧客間的收發網絡看，僑批局網絡如何植根於華人社會與僑鄉社會並與之有着深刻的互動關係？這是否說明了跨國華人社會內部運作的某些法則？2、跨越東南亞與華南兩地的龐大的僑批局網絡在地域結構上有何特點？換言之，為東南亞華僑與家鄉僑眷間的僑批往來架起橋樑的僑批局網絡是由什麼樣的環節組成的？3、在組織形態上，龐大的跨國僑批局網絡按照什麼方式組織起來？或者說，不同地域間的僑批局通過什麼方式建立穩定的聯網關係？

二、僑批局網絡與華人社會的互動關係

1. 僑批局網絡的發展

由於僑批業對東南亞華僑及家鄉僑眷生活至關重要，所以一直備受重視。1940年代末饒宗頤主編的《潮州志》，對僑批業的產生及運作有如下說明：「潮州地狹民稠，出洋謀生者至眾，居留遍及暹羅、越南、馬來亞

群島、爪哇、蘇門答臘等處，其家書匯款，向賴業僑批者爲之傳遞，手續簡單而快捷穩固。厥後雖有郵政及國營銀行開辦，然終接乘民營批局業務，因華僑在外居留範圍既極廣，而國內僑眷又多爲散處窮鄉僻壤之婦孺。批業在外洋採代收方法，或專僱夥伴一一登門收寄，抵國內後，又有熟習可靠批腳逐戶按址送交，即收取回批寄返外洋，仍一一登門交還，減少華僑爲寄款而虛耗工作時間。至人數之繁多，款項之瑣碎，既非銀行依照駁匯手續所能辦理，其書信書寫之簡單，荒村陋巷地址之錯雜，亦非郵政所能送遞，故批業之產生與發展乃隨僑運，因果相成。」⁴

由上可見，僑批局因應華僑與家鄉間的匯款和家書聯繫的需要而興起，在早期官方郵政局體系欠發達時，華僑與家鄉間的聯繫主要通過僑批局進行。據筆者統計，1910年前潮汕和東南亞兩地就創設了再和成偉記、振盛興、陳炳春、和合祥、魏啓峰、萬興昌等51家僑批局，1910年代兩地又新創立了132家，1920年代由於東南亞經濟的持續發展，移居東南亞的潮州人及滙回家鄉的信款的數量皆大大增加，該時期僑批局的創立進入一個高峰，共有217家。不過1929—1931年的世界經濟危機對僑批局發展有很大的打擊，不少的僑批局如森峰號、致成號等相繼倒閉，經濟不景氣導致30年代僑批局的發展比不上20年代，只有181家批局創立。1937—1945年間的世界大戰對僑批業造成更大打擊，在日本佔領期間，大部份批局停業或轉到後方秘密經營。1946年抗戰勝利後，由於中國出現惡性通貨膨脹及由此導致匯兌業的極大的投機性，該時期僑批局如雨後春筍般建立起來，1940年代新創立的274家批局中大部份是戰後創立的（參見表一）。

民國時期也是中國近代國家進程下郵政銀行體系逐漸發展的時期。1914年中國加入世界郵聯，逐漸採用國際規範，把郵政業納歸國有並開始加強對民間信局業的管制。1918年國民政府曾下令取締民間僑批局，後在華僑界和地方社會的力爭下，得以無限期展延以至郵局發達到可以取締僑批局爲止。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再次下令取締僑批局，又遭到華人社會的廣泛反對。經過多方交涉，經營國內信件業務的民信局准予延至1934年最後結束，而經營海外僑批的民信局定名爲批信局，准予繼續經營海外僑批業務，不過此後郵政局對僑批局實行了註冊制度及各種限制措施，試圖把僑批局的經營掌握在自己的控制之下。⁵ 與此同時，國民政府的金融機構也在國內外廣設分支機

4 饒宗頤，《潮州志》（汕頭：汕頭藝文印務局，1949），〈實業志〉，〈商業〉，頁72。

5 廣東省郵政廳管理局檔案，全宗號29，目錄2，卷487，頁13-14。

構，試圖壟斷僑匯經營。儘管這時期郵政業與國家金融業都有長足發展，但是以分支機構最多、分佈最廣的郵政局而言，其服務範圍最多只能到達城鎮，未能深入廣大農村，直至1940年，潮汕地區不通郵村鎮仍達88.3%（見表二）。

相比之下，僑批局的發展儘管受到不少限制，但是無論是在批局的數量上還是分佈的廣泛性上都令官方的僑匯經營機構望塵莫及。據陳春聲統計，1935年在汕頭郵局領有執照的批局共110家，其設立於海內外各地的「分號」共790家。⁶ 到戰後時期的1948年，據筆者統計，在汕頭段領有執照的僑批局雖減少為78家，其在海內外的總分號數仍達613家，其中潮汕地區231家，港澳及東南亞地區382家（見表三）。另外，我們也可看到僑批局在東南亞和潮汕地區的分佈非常廣泛，在東南亞，僑批局不但分佈在主要的港口城市如新加坡、吉隆坡、馬六甲、巴達維亞、曼谷等，而且在柔佛、霹靂州等內部州府和中小城鎮的數量也非常可觀，基本上覆蓋東南亞潮州人的主要聚居區。在潮汕地區，僑批局的分佈也基本覆及各主要城鎮，再加上數以千計的批腳的登門服務，僑批局網絡的服務範圍幾乎達到潮汕僑鄉的每個僑戶。

2. 僑批局網絡與華人社會的契合

如上文顯示，民間僑批局網絡與官方的郵政金融體系最明顯的差別，在於其能根植於海外華人社會與僑鄉社會，這除了表現於其空間分佈的廣泛性外，還主要表現於其親民的服務方式，例如僑批局採用登門服務的方式便無形中使他們與華僑、僑眷的生活息息相關。據有信莊批局經理芮詒墳回憶，新加坡有信莊收滙僑批，「除店前外，還須間派專人，深入各個橡膠園、錫場、工廠接批並按期送回唐山親人回批，不少送批員還代寄批人寫批和宣讀回批仔，務使寄批人心滿意愜，有的在聽到鄉音家訊時，感至流淚，而問長問短，抱頭痛哭，誤認收批員亦和舊時水客一樣從唐山來！」⁷ 在國內，僑批局也僱請熟習「批腳」（僑批員）深入窮鄉僻壤之處，務必將僑批準確地送到收批人手中，再加上代寫批信、回批等服務，華僑／僑眷便把僑批員視若一家人。此外，為滿足華僑的需要，僑批局甚至採用賒滙的方式，先替華僑墊款寄批，回批到達後再收回批款，因而達至與華人社會的相互信賴。在此

6 陳春聲，〈近代華僑匯款與僑批業的經營——以潮汕地區的研究為中心〉，《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0年，第4期，頁57-66。

7 芮詒墳，〈有信銀莊（批局）瑣憶〉，《汕頭文史》，第4輯（1987），頁96。

值得探究的是：為什麼僑批局與華僑／僑眷間的關係如此親密、熟悉並擁有高度的信用關係？為什麼僑批局可以擁有和支持如此廣泛的服務網絡？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兩點：

第一、僑批局的經營網絡與東南亞一潮汕華人社會的內部結構具有一致性。潮汕社會的組織結構是建立在由血緣、地緣關係發展起來的鄉族關係的基礎上，這種鄉族關係再通過移民的網絡移植於東南亞，因此形成以同鄉會、會館和宗親會等組織為基礎的東南亞華人社會。僑批局的經營網絡亦大致如此。據姚增蔭在《廣東省的華僑匯款》中稱，「（僑批）其營業或為專業或由一般商號兼營，其營業範圍類多帶有地方性。潮州幫、梅屬幫、瓊州幫、以及福建幫為其大幫別。各大幫之中，又可按其所屬縣份劃分為若干小幫。各幫批局的業務皆以其本縣本鄉者為主。在南洋如此，在國內亦然。」⁸ 我們發現許多僑批局經營網絡具有鄉族色彩。例如創立者為澄海上華鎮人的振盛興批局，其成立之初只接收上華鎮各村的華僑批信，後來所擴大的投遞範圍也僅是澄海及毗鄰的潮州鄉鎮。⁹ 同鄉同族的關係有利於華僑與僑批局之間信用關係的建立，在基本上仍屬於道德法約束的傳統社會，鄉族關係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人們信用關係建立的基礎和保證。

在發批的環節上，為保證僑批能迅速送交正確的收批人，僑批局所請批腳均為當地土生土長的人，他們「對族親鄉鄰、荒村陋巷、孤屋獨寮、圍塢合畝無不熟悉，僑批封上只寫村名，『批腳』均能一一送到。」¹⁰ 例如上文所提澄海振盛興批局所請批腳基本為上華鎮曾姓的族人，其它如饒平隆都萬興昌批局、潮陽西臚勤利恒記批局、普寧和合祥批局等所請僑批員都是該鄉族人。¹¹ 正是僑批局經營網絡的鄉族性，確保了它與華僑／僑眷間的熟稔與信任關係，也因此與華僑／僑鄉社會達成水乳交融的關係。

第二、僑批局經營網絡與華人商業網絡的重合。雖然本文主要討論僑批局網絡，但是僑批的經營卻自始至終不能脫離其他商業，大部份僑批局都兼營他業，這在《潮州志》中有所反映：「至國內批局在民國二十年以前，每百元僅得利益一元，而負擔派工消耗等費用。二十年間改組工會成立，始倡議增至二元，戰後擬加至六元，因外洋批局不同意，現大率在三元至四元

8 姚增蔭，《廣東省的華僑匯款》（上海：商務印書館，1943），頁18。

9 鄒金盛，《潮幫批信局》（香港：藝苑出版社，2001），頁28。

10 鄒金盛，《潮幫批信局》，頁34。

11 鄒金盛，《潮幫批信局》，附錄1，〈汕頭市僑批業公會會員批夥領取證明書名冊〉。

間。汕頭批局因利益微薄，若設一號而專業僑批，殊難支應必須消費，故多有他業兼營。在二十年間，汕頭專營僑批之商號，全業中幾十不得一，大都為匯兌業與收找業兼營者。此外如運銷業、客棧業、茶業、酒業、糖業、出口業等亦各有兼營僑批者。」¹²

由上可見，兼營他業可以降低僑批業的成本，不但如此，兼營他業還有助於僑批業顧客網絡的建立和擴展。我們發現，無論是在東南亞還是潮汕內地，大部份僑批業者都以經營商業起家，再受顧客委託而兼營僑批，因此商號既有的顧客網絡自然就成為僑批局網絡的基礎。事實上，兼營僑批業與原有商業的發展是相輔相承的，因為兼營僑批業既可以給商號增加資本（對東南亞的商號而言），又可增加服務的多樣性而提高其商業信譽。在一個以商業為導向的華人社會，僑批業與商業的「同謀」使它更加因循華人社會的組織結構，從而最有效地發展出其龐大的服務網絡。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經營僑批對大多數商號來說無利可圖，那為什麼還有那麼多商號經營僑批呢？筆者到泰國、馬來亞及潮汕地區作調查訪問時，曾訪問了吉隆坡鄭綿春、澄海振盛興和潮陽德順盛等批局的經營人或其後代，他們都表示經營批局不賺錢，或所賺手續費僅能維持支出。那為什麼還有這麼多商號經營批業呢？受訪者回答的真實度如何？為探討此問題，我們有必要仔細分辨在東南亞與潮汕地區不同的僑批局間的差別。在為數眾多的僑批局中，有一些僑批局在東南亞與中國均設有分號，在僑批經營中直接參與國際金融匯兌或從事國際貿易，從而賺取高額利潤；還有很多批局是地方性的批局，只負責地方性僑批與回批的收發，因而主要依靠手續費來維持運作。不賺錢的批局大概是針對後者而言，不過此類批局對本文研究僑批局與華人社會的互動關係卻有重大意義。

在訪問中，曾在泰國呵叻府（Nakonrachasima）經營僑批業的丁翀先生道出了其中的真諦：「只是為了方便，搞好關係。」¹³ 此語說明了僑批局服務於社會的性質，這也反映了東南亞—華南跨國華人社會中社會互助的內在機制，而擔當這一社會互助功能的便是僑批局等商業機構。商業機構在海外華人社會中的重要地位可以反映在許多層面上，不但各項慈善事業、社會福利

12 饒宗頤，《潮州志》，〈實業志〉，〈商業〉，頁75。

13 2001年10月及2003年9-12月筆者曾先後訪問過汕頭振盛興批局的經營人曾壽田先生、潮陽德順盛批局的後人馬陳宣、潮州市泰國歸僑丁翀及吉隆坡鄭綿春的經營者鄭浩生先生，筆者對於他們的受訪及提供的幫助至為感謝。

爲商人所推動，而且所成立的各級商會還扮演實際領導的角色。¹⁴ 商業機構的這種功能再通過投資、捐資等方式也深入到僑鄉社會的體內¹⁵，從而導致僑鄉社會的轉型，使之愈益趨同於東南亞華人商業型社會，僑批經營的社會互助性質便是在商業型東南亞一華南跨國華人社會中商業結構功能化的表現。通過以上諸多線索，大致可以一窺東南亞一華南華人社會作爲一有機體的輪廓及其內部互動的機制。

三、僑批局網絡的多重結構關係

上文討論了僑批局網絡的發展及其與華人社會的互動關係，本節將進一步探討僑批局網絡的內部構成。廣東省檔案館所存檔案中包括了大量有關汕頭僑批局及其海內外「分號」的資料。根據「中華民國25年各批局聲請書副份」，1936年共有98家批局向汕頭郵政局申請執照，這些批局所登記的海內外的號數（總、分號數）達824家，平均每家批局的號數約8家，其中在海內外的號數在6—10家者最多，共53家；到1948年，這些批局在海內外的號數有明顯增長，根據「廣東郵區汕頭段各批信局聲請換發37年執照表」，在登記的84家批局中，其海內外的總號數多達1040家，平均每家批局的號數達12家。1936年只有有信莊批局在海內外的總、分號數在21家以上（共23家），而到1948年總、分號數在21家以上的批局年則增至9家，其中汕頭萬豐發批局在海內外的分號數最多，共48家，其「分號」包括啓峰（揭陽）、政記（棉湖）、喜合（潮陽）、黃茂利、陶合（黃岡）、福成（隆都）、潘合利（店市）、普通、如陶莊（潮安）、邱發利（意溪）、有信（澄海）、合豐盛（湯坑）、桂興（留隍）、永興盛（流沙）、同春、興合公司、吳長記、同春森記、仁友公司、忠和原芝、人壽堂、鄭永和、德安堂、和興公司、建豐公司、永桂合、黃坤合、益成禮記、永成發、鄭和發、林升合、榮和公司（坤甸）、榮盛利、振華豐、永成豐、永興盛、義瑞興、正基、炳合豐、慶順利、明興發、永昌利、泰記、潮源興、展亞、倫敦（盤谷）。¹⁶

14 參見劉宏，《戰後新加坡華人社會的嬗變：本土情懷・區域網絡・全球視野》，頁16-19、41-80。

15 參見黃挺，〈商人團體、地方政府與民初政局下之社會權力〉，《潮學研究》，第9輯（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2001），頁175-236。

16 廣東省郵政管理局檔案，全宗號29，目錄2，卷382。

根據僑批局在郵政局登記的海內外「分號」的列表，似乎許多批局在海內外都建立了龐大的跨國網絡，不過對這些僑批局及其內地「分號」作進一步的系統分析後，我們發現許多潮汕內地的批局同時被汕頭眾多批局登記為其「分號」。例如1936年汕頭許福成批局在各地的「分號」包括黃岡陶合號、蓮陽信成莊、店市林春莊、東隴協成興、潮安聚豐莊、潮陽劉喜合、揭陽魏啓峰、棉湖洪萬興和曼谷許明發，但是統計發現，黃岡的陶合號還被汕頭和合祥、協成興、有信、萬興昌等4家批局列為「分號」，在許福成的6家分號中，潮陽劉喜合和揭陽魏啓峰被汕頭批局列為「分號」的最多，分別是53家和43家。上述例子顯示，被汕頭批局列為「分號」的內地批局中，除了有個別屬於垂直的總號一分號的隸屬關係外（例如東隴協成興—汕頭協成興、揭陽魏啓峰—汕頭啓峰棧和棉湖洪萬興—汕頭洪萬豐），其餘大部份只是平等的代理關係。¹⁷ 據此可見代理關係在連接內地僑批局與汕頭僑批局間的重要作用——在以汕頭市為中心的潮汕地區僑批局網絡中，到達汕頭的批信除了小部份能直投汕頭及其附近郊區外，其他潮屬八縣的僑批並不能直接投遞，而是需要當地的僑批局負責。如若進一步推斷，就可發現僑批局網絡的多元空間：在僑批局網絡中，地方具有中心的意義，各個縣城乃至其屬下鄉鎮的僑批局都建立了以己為中心的收發網絡，然後向上逐層遞進，最後匯歸為以汕頭為中心的潮汕地區的僑批局收發網絡。

東南亞的僑批局網絡也體現了相同的特徵，有不少僑批局本身並沒有在中國本土擁有分發批局，而只具有地方性網絡，它們收到的僑批需要交由上一層的僑批局進行轉遞。例如，在馬來亞柔佛州的巴株峇轄，兼營僑批匯兌生意的義順昌雜貨店是一間地方性的商號，為完成僑批的流通過程，它與新加坡的洪萬成批局建立代理關係，將收來的僑批交給後者，由後者轉遞給潮汕僑眷。¹⁸ 為論述的清晰起見，我們把那些只擁有地方性的收發網絡的僑批局稱為「草根批局」，而將那些能建立直接跨國聯繫的批局稱為「跨國批局」（事實上，這兩者並沒有截然的界限，大部份跨國批局同時發揮草根批局的功能）。以下簡論以新加坡為中心的多重僑批局網絡的概況，例如1910年前由李偉南等建立並在新加坡潮人社會享有聲譽的再和成偉記批局，除了

17 汕頭市郵局檔案，全宗號86，目錄1，卷344。陳春聲也從聯號創立時間的先後證明了這一點，見陳春聲，〈近代華僑匯款與僑批業的經營——以潮汕地區的研究為中心〉，頁57-66。

18 南方學院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中心，《潮人拓殖柔佛原始資料彙編》（馬來西亞新山：南方學院，2003），頁269。

在新加坡作為草根批局建立自己的收批網絡外，作為跨國批局，它還擁有新加坡三發號、廣成公司行批局、天安共三家草根批局所建立的網絡，同時，它的網絡範圍還輻射到馬來亞的柔佛州和芙蓉及荷屬印尼西加利曼丹的三發坡（Sambas）。¹⁹大致上，以新加坡為中心的僑批局網絡除了在新加坡建有地方性的僑批局網絡外，還覆及馬來亞柔佛州（Johor）的麻坡（Muar）、昔加目（Segamat）、巴株巴轄（Batupahat）和吉蘭丹（Kelantan）、丁加奴（Terengganu）、彭亨（Pahang）、雪蘭莪州的巴雙坡（Klang）、沙撈越的巴谷坡等地，在荷屬印尼，其網絡範圍包括加里曼丹島的三發坡、蘇門答臘島的占卑（Jambi）和邦加島（Bangka）、班年。²⁰由此我們看到，新加坡一方面作為國際港口城市成為跨國僑批局網絡在東南亞地區的樞紐，另一方面新加坡能成為東南亞僑批局網絡的樞紐在於得到周邊地方僑批局網絡的承托。

在馬來亞其他地區，馬六甲、吉隆坡和檳城的地位雖然較新加坡遜色，但它們也與汕頭建立聯網關係，成為跨國僑批局網絡在東南亞區域的樞紐城市，它們的網絡範圍大致上分別覆蓋南馬、中馬和北馬地區。在檳城的僑批界中，潮陽人林德音是其中的佼佼者，早在1917年林德音便在汕頭獨資創立恒記行，稍後又在檳城創立承福興批局，與汕頭恒記行共同經營香汕雜貨和僑批業生理。1940年後為擴大業務，林德音又在檳城另創恒記棧，由其長子李為儀掌理，次子林碩夫負責經營汕頭恒記行，承福興批局則歸其侄輩經營²¹，到三、四十年代，恒記棧在該地區建立了頗有影響的僑批局網絡。潮利亨合記是在檳城頗具影響力的另一家批局，約於1933年由潮陽人陳子余建立，它在汕頭的聯號潮利亨批局約創於1920年，估計前者是後者的分號，到1948年，兩號的負責人分別是陳見民和陳子余。²²坤甸的僑批業也非常引人注意，根據表三，1948年在坤甸設立的潮屬批局多達29家，其中汕頭信和成批局在坤甸建立的網絡最廣，其聯號包括信和成、和平、吳長江、源合興、林木榮、興合、榮成禮記、合和成等8家²³，可見坤甸在加里曼丹島的僑批局網絡中處於核心地位。在荷屬印尼，除了蘇門答臘島的僑批局屬於新加坡的

19 鄒金盛，《潮幫批信局》，頁328、356、371、433、440、452、477。

20 散見鄒金盛，《潮幫批信局》，頁312-537。

21 潘醒農，《馬來亞潮僑通鑒》（新加坡：南島出版社，1950），頁123。

22 廣東省檔案館藏汕頭市郵局檔案，全宗號86，目錄1，卷344；廣東省郵政管理局檔案，全宗號29，目錄2，卷382。

23 廣東省郵政管理局檔案，全宗號29，目錄2，卷382。

僑批局網絡外，巴達維亞則是爪哇島和周邊地區的另一個中心，不過，由於荷屬印尼的潮州人並不多，所以來自巴達維亞的批信也不佔主要地位，有一段時間由於荷屬印尼與中華民國尚未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以巴達維亞為中心的僑批局網絡還隸屬於新加坡僑批局網絡之下。²⁴

泰國的僑批局網絡也與新馬類似，它是由多個地方的僑批局網絡組成並最後統歸於以曼谷為中心的區域網絡，以下以陳炳春、鄭成順利振記為例說明泰國的跨國批局在曼谷及其他各府擁有地方網絡的情況。陳炳春批局最初是一家銀號，大約於1907年首創於汕頭，旋後又在曼谷創立陳炳春銀莊，屬於陳炳春家族的產業，由銀行、匯兌業兼營僑批業，1936年汕頭陳炳春批局的負責人是陳尹衡，由於暹汕之間可以直接往來，曼谷陳炳春號在該區域建立了頗有影響力的僑批局網絡，余林合和曾金記大銀批信局等本地的草根批局都委託它代轉僑批²⁵，1946年後陳炳春家族的網絡又擴展至新加坡和香港，分別在兩地增設了陳炳春銀行和陳嘉彰銀行。由於經營有方，陳炳春家族富甲一方，1946、1947年陳炳春的家人要把不幸遇害的陳炳春及其長子陳益章的靈柩運回家鄉安葬時，家鄉人紛紛準備祭品迎拜以期獲得雙倍的回禮，以致「趕人食早早去拜陳炳春」的俗語廣為流行。²⁶ 鄭成順利振記是泰國另一大批局，其汕頭聯號與之同名，大約於1912年由鄭敦翰及友人合創。作為一家跨國批局，曼谷鄭成順利振記在本地區建立起大型的僑批局網絡，其網絡範圍除了包括曼谷市郊外，還輻射至曼谷挽叻縣、泰國洛坤府（Nakhonsrihammarach）、叻丕府（Ratchaburi）等地。²⁷ 由於擁有廣大的草根批局聯號，戰前泰國鄭成順利振記每月寄出的僑批數量在旺季時高達一萬多件，平時也有四、五千件，是泰國經營僑批數量最多的批局之一。²⁸

綜上所述，分別以東南亞華僑和其家鄉僑眷為起點和終點的跨國僑批局網絡是由多個層次的地方網絡（中間環節）組成的，在這樣的僑批局網絡

24 在二、三十年代，荷屬印尼的批信多經由新加坡郵政轉寄，參見廣東省檔案館藏郵政局檔案，全宗號29，目錄2，卷375，頁77-82。

25 鄒金盛，《潮幫批信局》，頁118、205。

26 鄒金盛，《潮幫批信局》，頁49。

27 鄒金盛，《潮幫批信局》，頁160、171、172、180。

28 參見廣東省郵政管理局檔案，全宗號29，目錄2，卷329，〈廣東郵區汕頭段1938年郵政概況月報〉，「汕頭地方收發暹羅香港及各屬殖民地批信及回批統計表」（1938年1-6月）；全宗號29，目錄2，卷330，〈廣東郵區屬下局批信統計表〉，「汕頭地方收發暹羅香港及各屬殖民地批信及回批統計表」（1938年7-12月）。

裡，每個地方對下都有一個網絡，而對上又從屬於另一個網絡。舉例來說，僑居馬六甲屬萬里望（Merlimau）的華僑陳應傳，要寄批回其家鄉澄海縣山邊鄉的親屬，便要依賴以下各層次的僑批局網絡：萬里望沒有僑批局，陳應傳要到與其相隔不遠的麻坡（屬於柔佛州）泰生堂寄批，不過泰生堂與汕頭並沒有直接的跨國聯繫，而與新加坡的洪萬成批局有代理關係，於是陳應傳的僑批便進入新加坡洪萬成批局的僑批局網絡，後者與汕頭的洪萬豐有聯網關係，因此陳應傳的僑批自然到達汕頭洪萬豐批局，洪萬豐批局再通過其在店市的利發隆莊分發到與其鄰近的山邊鄉，回批則是沿着上述路線的逆方向回送至陳應傳。²⁹ 由此可見，為萬里望陳應傳與其家鄉澄海家屬間的僑批往來架起橋樑的是由麻坡、新加坡、汕頭、澄海店市多家批局共同組成的多重的僑批局網絡。

那麼，這樣的僑批局網絡在地域分佈上有什麼特點呢？在東南亞，基本上可視為商業社會的華人社會³⁰，其分佈與商貿中心重合，因此僑批局網絡的中心便是該區域的商貿中心，各級地方性的商貿中心建立的僑批局網絡將收到的僑批往上遞進，再滙聚到巴達維亞、新加坡、馬六甲、吉隆坡、檳城、曼谷等大型商貿中心或港口城市，然後到達以汕頭為中心的收發網絡，再以城鎮為中心漸次向下一級鄉村輻射（參見圖一）。由此可見，龐大的僑批局網絡是由各個地方自我組成的地域網絡相互嵌合的體系，正是由於有眾多的地方性僑批局網絡作承托，多個國際港口城市相互建立跨國聯網關係，跨國僑批局網絡才得以覆及東南亞的每個華僑及其潮汕僑鄉的每個鄉村，並成為東南亞華人社會與僑鄉社會互動的承載體系。

四、僑批局網絡的組織形態

從地域分佈的向度上，我們看到僑批局網絡是由多重的地方網絡組成的，那麼從組織形態上，這麼龐大的跨國僑批局網絡又是按照什麼方式組織起來呢？換言之，東南亞或潮汕區域的草根批局與跨國批局間以及分別位於

29 汕頭市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所藏有關陳應傳家族的僑批複印件。

30 相關論述參見Wang Gungwu, "Traditional Leadership in a New Nation: The Chinese in Malaya and Singapore", in Gehan Wijeyewardene, ed., *Leadership and Authority: A Symposium*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8), 208-222; Yen Ching-Hwang, "Class Structure and Social Mobility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00-1911", *Modern Asian Studies*, 21:3 (1987), 417-445.

東南亞與潮汕兩地的跨國批局間如何建立穩定的合作關係？後者通過什麼方式來克服越洋網絡所潛在的不穩定因素如信任問題等？上文在探討地域性僑批局網絡的結構關係時曾顯示，地方性的草根批局與跨國批局間有兩種關係模式：一種是垂直性的總號與分號的關係，另一種是平等的代理關係。這兩種關係模式同樣適用於潮汕地區與東南亞兩地的跨國批局間的聯網關係，不過這兩種關係建立的背後卻呈現出複雜的組織形態，通過對大量跨國批局聯網關係的考察，筆者發現僑批局網絡的組織形態大致可分三種：家族網絡、合股關係網絡和鄉族商業網絡，事實上，這幾種組織形態在僑批局網絡中往往不是截然分開的，而是交織在一起，下文將對這幾種組織形態在僑批局網絡中的地位、不同時期的發展以及背後的影響因素等方面作詳細討論。

1. 家族網絡

在華人傳統企業中，由於產權和信用的問題，家族企業是最常用的方式，因此也受到學術界的重視。³¹ 1936年75家在汕頭郵局註冊的潮屬批局中，大約有51家批局至少在國內或海外建有一間家族聯號，佔了所有批局的68%，1946年擁有家族聯號的批局減少到42家，但仍佔75家批局的56%³²，由此可見家族網絡在僑批局網絡中的重要地位。在這75家批局中，綿發號的家族網絡很典型，1936年汕頭綿發號在海外的分號包括新加坡綿發號、吉隆坡東亞號和馬六甲綿元號，掌管者分別是鄭則士、鄭則光、鄭則民和鄭漢傑，前三人爲同胞兄弟，鄭漢傑爲鄭則士的二子，整個批局網絡的家族色彩十分明顯。到1946年後，綿發號家族企業在吉隆坡加創了鄭綿春號，由鄭則士的另一個弟弟鄭則愈的兒子鄭漢麒掌管³³，可見綿發號批局的家族網絡到戰後還

31 參見Chi-cheung Choi, "Competition among Brothers: The Kin Tye Lung Company and its Associate Companies", in Rajeswary Brown ed. *Chinese Business Enterprise in Asia* (London: Routledge, 1995); Stephanie Po-yin Chung, "Doing Business in Southeast Asia and Southern China—Booms and Busts of the Eu Yan Sang Business Conglomerates, 1876-1941", in Leo Douw, Cen Huang and David Ip, eds., *Rethinking Chinese Transnational Enterprises: Cultural Affinity and Business Strategies* (Richmond, Surrey, UK: Curzon Press; Leiden, 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2001).

32 根據廣東省檔案館藏汕頭市郵局檔案，全宗號86，目錄1，卷344，「中華民國25年各批局聲請書副份」及廣東省郵政管理局檔案，全宗號29，目錄2，卷371，「汕頭段三十五年份已掛號批信局詳情表」統計而成。

33 鄒金盛，《潮幫批信局》，頁483；汕頭市郵局檔案，全宗號86，目錄1，卷344。

沒有發生變化。其實綿發號並不是一家專業的批局，它是依靠經營酒廠發家的，早在1905年世居潮陽第一區的鄭則士、鄭則英、鄭則民、鄭則光和鄭則愈（振文）五兄弟便在汕頭創辦鄭綿發酒行，1908年又在新加坡創立鄭綿發酒莊，繼而又先後在吉隆坡、馬六甲等地創立酒行和酒廠，僑批的生意是在酒廠生意的基礎上，為滿足鄉人的需要而兼營的。綿發號家族企業自創立後一直由鄭氏家族掌握，1950年代後綿發號家族企業的領導權開始逐漸轉到第二代人手裡，其中包括鄭則士的二子鄭漢川、鄭漢亮和鄭則民的兒子鄭浩生等，綿發號的僑批生意一直經營到1977年汕頭的僑批業務統一由國家銀行經辦為止，不過其酒廠生意仍然綿延至今。³⁴

不過，除了少數批局能像綿發號一樣，其海內外聯號完全由本家族掌握外，大部份具有家族網絡的批局同時與他姓批局建立有代理關係，以下將具體分析1936年洪萬豐、振盛興、協成興和啓峰棧在潮汕和東南亞地區所建立的家族性和代理性的僑批局網絡的情況（參見表四）。例如洪萬豐在汕頭、棉湖、新加坡、曼谷、檳城、越南堤岸和河婆的聯號幾乎都以「洪」姓為名，掌管人一律是揭陽籍洪氏，僑批局網絡的家族色彩很明顯，不過在14家分號與聯號中，除了6家批局屬於揭陽洪氏掌握外，其他8家批局可能便是通過代理關係建立網絡的。1946年洪萬豐批局在河婆分號的負責人易為洪明雲，曼谷的分號改為洪萬發，負責人是洪賢生，家族網絡的情況大致未變，不過在海內外的代理聯號增加到13家³⁵，明顯超過家族聯號的數目，可見戰後洪萬豐批局網絡的擴展主要是通過增加代理聯號的方式進行的。

振盛興是另一具有家族性網絡的僑批局，它的創始人為曾仰梅，又名曾國馨，1899年首先在曼谷創立振盛興批局，1908年先後在汕頭和家鄉澄海圖濠鄉建立分號，在1946年的註冊資料中，汕頭和圖濠鄉批局的負責人易為曾慎一，是振盛興批局的第二代掌理人，同時增添在曼谷和香港的聯號「振盛興」和「遠明號」，負責人分別是曾壯吾和曾益三。1950年代後，汕頭振盛興批局的負責人易為曾壽田，2001年10月我在汕頭採訪曾壽田先生時得知，曾壽田和曾壯吾為胞兄弟，可以說，他們是振盛興批局的第三代掌理人，不過同樣是這樣明顯的家族批局，它的僑批局網絡中也有幾家是代理聯號。³⁶

協成興也是一具有家族性網絡的批局，它在汕頭、澄海東隴和曼谷的

34 參見潘醒農，《馬來亞潮僑通鑒》，頁185-189；鄒金盛，《潮幫批信局》，頁483。

35 廣東省檔案館藏廣東省郵政管理局檔案，全宗號29，目錄2，卷371。

36 鄒金盛，《潮幫批信局》，頁28；廣東省檔案館藏廣東省郵政管理局檔案，全宗號29，目錄2，卷371。

分號都以「協成興」為名，分別掌管曼谷和汕頭協成興的許經緯和許漢平為父子。³⁷ 1946年東隴協成興批局的負責人易為黃潮存，僑批局網絡的家族性沒有變化，不過卻增加了兩家代理聯號，總共2間家族分號，9家代理聯號³⁸，從數字上看，代理聯號仍佔絕對優勢。

汕頭啓峰棧是另一家同時通過家族關係和代理關係建立跨國網絡的批局，從表四中我們看到汕頭啓峰棧、揭陽啓峰號和新加坡新峰棧組成了啓峰棧批局網絡的核心部份，其中汕頭啓峰棧和揭陽啓峰號的負責人魏啓和、魏啓圃是兄弟，新加坡新峰棧的負責人魏茂中是魏啓和的兒子，魏茂中在1938年早逝，此後他的弟弟魏茂碩開始擔任重要角色。饒有趣味的是，在海內外設有家族聯號的啓峰棧最初是通過代理其他批局的僑批業務而發展起來的。魏啓和家族經營僑批業務最早可追溯到其祖父魏福羅，魏福羅早年在家鄉做夏布生意，在一次偶然的經歷中得到一位「澄海伯」的賞識，受委託為揭陽的僑批代理，在「澄海伯」的資助下，魏福羅於1879年創立魏森峰號，專門代理揭陽地區的僑批業務，同時兼營夏布生意。1904年魏福羅去世後，其兒子魏履巧繼任了魏森峰的業務，1915年魏履巧將魏森峰改組為專營僑批業務的「魏啓峰批局」，由其兒子魏啓和任首屆主持人，開始着手擴大海外的代理範圍³⁹，從新加坡新峰棧的創立時間可推知啓峰批局在海外建立家族聯號是在1930年代之後，不過創立家族聯號後的啓峰批局仍然致力於其代理批局網絡的拓展。

上述例子表明，在大多數家族性僑批局網絡中，代理關係的地位也很重要，從數目來看，代理商號的數目甚至比家族聯號多，而且從30年代到40年代的發展來看，還有增長的趨勢，前文所顯示1948年汕頭批局在海內外的總分號數較1936年增加了很多，這些增多的「分號」便主要是代理商號。受人力和財力限制，民營的家族企業很難在潮汕和東南亞地區廣設分號，所以便通過代理關係來擴大其僑批的收發網絡，提高競爭力。實際上，家族性僑批局網絡中的代理商號仍然主要設在潮汕地區，屬於僑批局的分發網絡，而在潮汕地區與東南亞間的跨國環節上，還是依靠家族網絡。

在僑批業的跨國經營中，最重要的莫過於資金的流動及由此牽涉到的信

37 2003年9月協成興批局少東家許敦煌先生在澄海接受筆者採訪時所述。

38 廣東省檔案館藏廣東省郵政管理局檔案，全宗號29，目錄2，卷371。

39 楊群熙編，《潮汕地區僑批業資料》（汕頭：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汕頭市文化局、汕頭市圖書館，2004），頁294-305。

用問題，家族企業經營的方式使上述問題迎刃而解。在家族統一管理之下，國內外不同地方的僑批局共有產權、共負盈虧，進而追求最有效的經營方法。

2. 合股關係網絡

在東南亞與潮汕地區的跨國環節上，僑批局網絡還有相當一部份是通過合股關係建立的。下面以新加坡致成號和汕頭森峰棧的例子作說明。

致成號和森峰棧早在1927年便停業，官方檔案裡所保存的三、四十年代的僑批局的註冊檔案裡找不到它們的記錄，不過僑批專家鄒金盛先生對它們的創立作了認真考究。據悉，新加坡致成號創立於「1829年，司理人黃繼英，澄海籍，……另在汕頭委託黃松亭，首創森峰號批局轉接批信。在家鄉澄海東湖建立致成批館，自收自投，至1927年停業。」至於森峰棧，「1880年開業，司理人黃松亭，是汕頭森峰號批局設於新加坡的分局，自成網絡。1927年停業。」⁴⁰從上述材料我們發現，雖然新加坡致成號在其家鄉澄海東湖鄉設有本號，但在汕頭卻需委託森峰號作中轉，那麼新加坡致成號與汕頭森峰號間是什麼關係呢？潘醒農主編的《馬來亞潮僑通鑒》中所收錄黃仙舟、黃松亭、杜以哲的傳記具體談到致成批局和森峰號創立的有關情況：

黃仙舟先生，諱倬瀛，以字行，澄海縣東湖鄉人，……其父基業翁……創致成染坊於烏橋，設致成號於小坡新街頭，每晨步行至染坊監督開工，然後步行回店……。 (黃仙舟) 民元年來星，繼承先人商業，掌營森峰棧、致成號及致合峰號（經營綢緞布匹匯兌）各生意。

黃松亭先生，澄海縣外埔鄉人，其生卒年月已不可考。早年於汕頭販賣魚露，勤儉機警，久而久之，積有餘資，遂合創森峰號於汕頭市。……乃親臨星鳩收帳項，因與杜崇烈、黃基業等君，合資創森峰棧於十八間後街，經營綢布及匯兌民信生意。

杜以哲先生，名崇烈、字彥良、號松峰，澄海蓮陽邨人，……仲舅……基業公也。……旋以其辛勤之所得，創森峰棧於新加坡。創森峰號於汕頭。⁴¹

40 鄒金盛，《潮幫批信局》，頁312。

41 潘醒農，《馬來亞潮僑通鑒》，頁101、160。

由上可見，森峰號在新加坡和汕頭均有設立，且並非黃松亭所獨資創立，其中新加坡森峰棧是黃松亭與致成號老闆黃基業（估計亦即黃繼英）及其外甥杜以哲等人合創，而汕頭森峰號也是黃松亭與杜以哲等人合創。由此可見，致成號老闆黃基業在新加坡森峰號與汕頭森峰號中都擁有一定的股權，新加坡致成號與汕頭森峰號間的聯網關係便是基於這種個人的合股關係。同樣，新加坡森峰棧與汕頭森峰號也因為有共同的合股人而建立聯網關係，不過因為合股人一致，批局的名號也相同，所以兩者間可能是總號與分號的關係，而新加坡致成號與汕頭森峰號間可能只是代理關係，正因為個人在多家批局間交叉的合股關係，黃基業的兒子黃仙舟得以「掌營森峰棧、致成號及致合峰號」。

在本文的論述中，如果有兩間批局的合股人一樣，或者有一方批局的創立者（對於獨資的批局）或持股人（對於合資的批局）是另一方批局的合股人，那麼本文稱這兩間批局的關係網絡為合股關係網絡。在這種網絡關係中，兩家批局可能是總分號的關係，也可能是平等的代理關係，前者主要適用於合股人一樣的兩家或多家批局，後者則適用於合股人並不完全對等的批局間，不過在一家批局的龐大的跨國網絡中，這兩種方式可能同時並存。⁴² 對於第一種總分號關係的合股網絡，新加坡有信莊和汕頭有信莊是有力的例證。據載，新加坡有信莊是由澄海縣城北門人黃芹生、澄海城內人李秉衡和潮安龍湖市人劉葵如共同創立，潘醒農主編的《馬來亞潮僑通鑒》收錄了這幾人的傳記，其中劉葵如的傳記裡提到新、汕兩地有信莊的關係，「民國十年（1921），又與黃芹生君等合創有信莊於二馬路；並於汕頭分設有信銀莊，以經營匯兌業。」⁴³ 又據《汕頭市僑批同業公會會員商號名冊（1948年）》載⁴⁴，汕頭市有信莊也是合資創立的，可見，汕頭有信莊與新加坡有信莊擁有共同的合股人，前者即為後者之分號。1936、1946年汕頭有信莊的負責人被登記為黃壽三，1948年易為黃孝廉，亦即創立人之一黃芹生的兒子，

42 合股關係是僑批局網絡建立的重要方式，此觀點原受濱下武志教授提出的網絡模式中「股」的概念的啟發，在與濱下武志教授的多次討論及其著作中，筆者受益匪淺，謹致謝忱！

43 潘醒農，《馬來亞潮僑通鑒》，頁201。

44 廣東省汕頭市檔案館藏財政廳檔案，全宗號4，目錄2，卷8，轉引自馬楚堅，〈潮幫批信局之創生及其功能的探索〉，載於李志賢主編，《海外潮人的移民經驗》（新加坡：新加坡潮州八邑會館、八方文化企業公司，2003），頁55-84。

在這段時間裡，新加坡有信莊的負責人一直是李東辰⁴⁵，合股經營的方式仍然很明顯。

榮豐利的僑批局網絡是另一個值得探討的個案，據《汕頭市僑批同業公會會員商號名冊（1948年）》載，汕頭榮豐利是合資創立的，1946年它在曼谷、香港、揭陽、興寧、梅縣和昆明等地均擁有以「榮豐利」為名的批局聯號，汕頭號與其它各地聯號的負責人分別是黃勤敏、徐名奮、徐名宏、黃徽猷、卓海鴻、徐春苑和徐瑞芳，徐名奮和徐名宏看來像族親，他們與黃勤敏都是豐順籍人⁴⁶，不過總體看來，各地的負責人之間似乎並不是族親，他們之間的關係，大概就是合股關係。而各地的「榮豐利」批局間可能是總分號關係。復安批局的跨國網絡同樣值得探究，1936年汕頭復安批局在香港、新加坡和曼谷的聯號都是以「復」字開頭的復安、復茂和復成，汕頭號與各地聯號的負責人分別是潮陽籍的黃逸民、謝梅萱、潮安籍的王佑明和揭陽籍的林直臣，各地負責人表面看來也沒什麼親族關係。汕頭福利批局的組織網絡也類似，1936年它在香港、新加坡和曼谷的聯號分別是福利、福成和茂利，汕頭和各號的負責人分別是潮陽籍的黃文秋、謝蘭春、晉江籍的薛木本和梅縣人熊孝則⁴⁷，他們看來也不像有親族關係，估計這兩家批局的網絡即屬於合股關係網絡。

潮州人僑批局的合股經營在當時相當普遍，例如新加坡萬豐隆信局是由洪寶華、林正興、林敘光、陳潮勤、陳仁卿、黃明利等人合股創立，它與汕頭洪萬豐批局建立聯網關係⁴⁸，又如曼谷松興泰批局由鄭敦耀、陳佃彬、黃景雲和謝木潮等人合股建立，其在汕頭的聯號是黃潮興批局。⁴⁹ 另外，1948年在汕頭的58家註冊批局中，合資創立的共28家，幾乎佔所有批局的一半。⁵⁰ 由此我們可以推知，合股關係是僑批局網絡建立的重要方式。由於資料的

45 廣東省檔案館藏汕頭市郵局檔案，全宗號86，目錄1，卷344；廣東省檔案館藏廣東省郵政管理局檔案，全宗號29，目錄2，卷371和卷382。

46 廣東省檔案館藏廣東省郵政管理局檔案，全宗號29，目錄2，卷371。

47 廣東省檔案館藏汕頭市郵局檔案，全宗號86，目錄1，卷344。

48 新加坡歷史檔案館藏商業檔案（Registry of Business），ROB017, "Buan Hong Long & Co", File Reference: 8656.

49 筆者於2003年11月到曼谷作田野調查時得以訪問鄭敦耀的弟弟鄭膺年先生，謹表謝意！

50 廣東省汕頭市檔案館藏財政廳檔案，全宗號4，目錄2，卷8，轉引自馬楚堅，〈潮幫批信局之創生及其功能的探索〉，頁55-84。

缺乏，我們不能肯定哪些批局的合股網絡屬於總分號的關係，哪些屬於代理聯號的關係，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代理聯號的關係佔更大的比重。潮汕批局與東南亞批局通過合股的方式建立代理關係，早在20世紀初日本人就作過研究，當時以東南亞為據點的僑批局中有90%以上在中國並沒有設立分局，而是通過代理局來建立合作關係，這種合作關係的方式之一即是共同出資經營，每年決算一次，利益平分。⁵¹ 合股代理關係在區域性的僑批局網絡裡也扮演重要角色，新加坡著名閩幫僑批業家林樹彥在接受訪談時也表示合股代理關係在其經營下的僑通行的批局網絡中佔有重要地位。僑通行戰後在香港、上海、福州、泉州、古田、廈門、吧城、舊港、泗水、沙撈越、怡寶、吉隆坡、馬六甲、檳城、等地設有近25家分行，營業範圍和僑批網絡遍達全中國，是新加坡閩幫數一數二的大型批局。以新加坡為據點的僑通行，其發展早期在中國並沒有分號，於是便「在唐山廈門開一個（聯號），由那邊的人做，我們這邊出資本投資，給那邊的人料理。」在東南亞區域，僑通行與馬來亞、荷屬印尼、沙撈越等內地聯號之間，有不少也是通過共同出資合股經營。⁵²

3. 鄉族商業網絡

在家族網絡和合股關係網絡外，鄉族關係和商業網絡在僑批局網絡中佔有最重要的地位，這主要表現於不同地方僑批局間的代理關係的建立。鄉族關係在僑批局網絡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正如前文所述，大多數僑批局的經營都帶有強烈的鄉族色彩，同樣，不同批局間通過鄉族關係而建立代理關係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如表四所示，揭陽籍的魏啓峰除了在汕頭、揭陽和新加坡的商號屬於家族企業外，它在安南、暹羅和坤甸的聯號永豐發、陳德華、李同春和源合興則屬於代理局，其負責人林君正、陳成煌、李春樹和許雙順均為揭陽籍人。又如1936年潮陽人黃日輝所掌握的汕頭福成批局也建立了以本邑人為主的僑批局網絡，它在各地的聯號陳四合、陳裕發（金甌）、劉喜合（潮陽）、陳益隆（隆江）、榮泰昌德茂（檳榔嶼）、和記、怡興（霹靂）、南茂興、泗利興（古樓）的負責人均是潮陽人。⁵³

51 楊建成主編，《僑匯流通之研究》（臺北：中華學術院南洋研究所，1984），頁86。

52 新加坡歷史檔案館口述歷史中心，Accession No. 147，「林樹彥訪談報告」，頁47、135-136；柯木林，〈新加坡民信業領袖林樹彥〉，載於柯木林、林孝勝，《新華歷史與人物研究》（新加坡：南洋學會，1986），頁173-179。

53 廣東省檔案館藏汕頭市郵局檔案，全宗號86，目錄1，卷344。

與鄉族關係相比，商業網絡與僑批局網絡的結合則較隱蔽，也更少引人注意。其實，如上文所述，大多數批局都兼營他業，有時候僑批業是在專營他業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原有商業的經營網絡便自然成為僑批局網絡的基礎，上文所提到的魏啓峰批局即為一例，魏啓峰批局最初是經營夏布生意的，它與「澄海伯」間的關係開始只是夏布的生意往來，後來在互相信任的基礎上才進一步建立了僑批的代理關係。無獨有偶，上文提到的致成棧也是以經營布業發家的，它經營的主要是洋烏布，在兼營僑批業後，僑批業和布業的關係相得益彰。新加坡致成棧在收到華僑的匯款後可用作布業的經營資本，而新加坡的洋布運到汕頭賣掉後便可收回本錢，用作分發批銀，它與魏啓峰批局的代理關係主要出於生意上的往來。同樣，在曼谷、汕頭、澄海東隴均設有聯號的協成興批局，其揭陽屬的僑批也主要委託揭陽魏啓峰批局分發，它們之間的代理關係也主要因為其他生意上的往來。⁵⁴

我們發現，在東南亞的草根批局中，雜貨店佔了相當大的比例，它們貨物來源的網絡很可能便是其僑批集散的網絡，下面將以泰國森利雜貨店的例子稍作說明。泰國森利號設在呵叻府，據森利號的少東家（老闆的兒子）丁狃稱，森利號是雜貨店，主要經營醋、米、牛皮、手錶等商品，他們從呵叻府的農村裡收購土產，再賣到曼谷，從曼谷買來各種雜貨，供應當地農村的需求。他們也經營僑批，從當地的華僑手裡收到批以後，交給曼谷的和合祥批局，和合祥再通過其在汕頭的分局來分發僑批。當我問及森利號與和合祥的關係時，丁先生講，他們之間很熟悉，彼此有生意往來，和合祥批局也是經營雜貨店的。⁵⁵ 由此可見，森利號批局與和合祥批局的聯網關係主要源於彼此間的業務來往，從這個層面看，商業網絡與僑批局網絡便很好地結合在一起。草根僑批局與跨國僑批局因為商業的因素而相互嵌合，其中除了涉及錢的流通和外匯限制外，更多地體現了不同商號間互惠互利的精神，由經營僑批而承擔的社會互助性又衍生出商業的互惠性，由此僑批網絡、商業網絡和跨國社會的互助功能相互交織、重疊，成為東南亞一華南跨國華人社會有機組成的重要脈絡。

家族網絡、合股關係和鄉族商業網絡在僑批局網絡的建立中往往不是單一而是交叉進行的。家族網絡、合股關係通過制度性或非制度性共用產權

54 根據2003年9月致成批局後人黃少雄及協成興批局少東家許敦煌先生的口述。對於他們的幫助，謹表謝意！

55 2003年9月丁狃先生在潮州接受筆者訪問時所述。

的方式，確立了國內外不同批局間穩定的合作關係，使之成為僑批局網絡的核心環節，而通過鄉族商業網絡建立起來的代理關係則有利於僑批局網絡的對外延伸，各種方式的結合保證了龐大的僑批局網絡的有效運轉。僑批業的有效運轉首先體現於批信遞解環節的迅速，據汕頭有信莊批局經理芮詒墳憶述，「海外僑批，一般都能如期在當天上午10時左右從郵局領出，逐封加蓋當日郵戳，覆核無誤，加貼回批。會計則稽考存欠，如果賬款不足，欲放欲留，統由經理立予裁決。每次來批不論多少，例於當晚辦理清楚，雖通宵達旦，務必悉力以赴，蓋明天一早，必須趕赴各處舟車第一幫。」⁵⁶ 其次是僑匯融通環節上的活絡便捷，據陳達考察，「自星加坡至汕頭，有時候並無現款滙歸，因總店與分館，即經營銀錢業或進出口貨業，彼此可以劃賬。或有時候由星加坡批館利用收入的批款買成南洋商品（例如米）運到汕頭售賣以資獲利。汕頭分館雖未接南洋總館的現款，但亦按照『批信』中所述的數目，由『派批』分送各匯款的家庭。」⁵⁷

在跨國僑批活動中，批信的遞解是其中最基本和最常規的活動，而僑匯的融通則富有活力和韌性，在僑匯的跨界流動及外匯轉換中，它既可以通過銀行匯兌業進行匯款，又可化錢為物，搖身變為進出口貿易的商品，甚至可以積壓資金，由代理局暫為墊款分發，一切因時因地而異。跨國僑批局對僑匯的應用，更因僑匯量大而牽涉到亞洲金融貿易體系的變動⁵⁸，個中的複雜性並非本文所能涵括，筆者將另文撰述。

五、結語

本文揭示了在近代東南亞華人社會與潮汕僑鄉社會間存在廣泛的僑批局網絡，這樣的僑批局網絡是由多個層次的地域網絡相互嵌合的體系，在對外的服務網絡上，由於其經營結構與華人社會的社會經濟結構一致，它深入東南亞與華南兩地華人社會。在僑批局的組織網絡上，通過家族網絡、合股關係和鄉族商業網絡等方式的有機結合，分佈於東南亞與潮汕地區的不同批局得以建立起相對穩定的聯網合作關係，無數張這樣的僑批局網絡相互交織、

56 芮詒墳，〈有信銀莊（批局）瑣憶〉，頁100。

57 陳達，〈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長沙：商務印書館，1938），頁89。

58 參見濱下武志著，朱蔭貴、歐陽菲譯，〈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重疊，共同構建了可以連接和滲透東南亞華人社會與華南僑鄉社會體內的社會經濟脈絡。關於僑批局網絡的社會性及其連接華人社會與僑鄉社會的功能，濱下武志早在1980年代就曾作過研究，通過對新馬華人社會的「合會」與「銀信匯兌」的研究，他指出：「銀信匯兌局具有悠久歷史，而且與區域社會保持密切關係而發生變遷。如果說合會是結合區域社會內部的民間金融組織，那麼銀信匯兌局是起着聯繫外部作用的組織。」⁵⁹ 不過，後人的研究，卻沒有繼續關心和深入探討僑批局之於華人社會互動關係的銜接功能，本文希望對僑批局網絡的探研和把握，有助於了解東南亞華人社會與華南僑鄉社會長期互動的內部機制。

在僑批局網絡上流通的不僅僅是僑匯，而且是各項以信件為載體的社會信息、觀念和情感等方面的交流，正是在這個層面上，海外華僑與家鄉僑眷可以在實際生活和想像中得以和諧統一、有效互動，從這個意義上說，海外華人社會與僑鄉社會同屬一個有機統一的跨國華人社會。目前從跨國社會的角度研究近代東南亞華人社會與僑鄉社會的成果還不多，陳春聲曾對澄海著名華僑陳子昭的僑批文書作過深入的解讀和考察，通過陳子昭的個案研究，他提出「僑鄉文化」的創造過程的提法，「正是在這種自然的、非戲劇性的日常交往中，所謂『僑鄉文化』才得以深刻而長遠地被創制出來。」⁶⁰ 這種提法富有啟發性，「僑鄉」並不是一個一成不變的實體，我們也應該以同樣的動態的視角去關注東南亞一華南跨國華人社會的發展脈絡。如果我們把研究視野擴大至中國或東南亞的近代史，將會發現跨國華人社會是該區域近代化進程的重要環節，如果對跨國華人社會的形成、內部的運作機制、社會結構和文化演進等方面做更深入的研究，相信會對中國與東南亞近代史的發展進程有更深刻的把握。⁶¹

（責任編輯：陳春聲）

59 濱下武志，〈傳統社會與庶民金融——新加坡、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合會」與「銀信匯兌」〉，載於中山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編，《華僑華人歷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廣州，中山大學東南亞歷史研究所，1985），頁 64-73。

60 陳春聲，〈從家書到公共文獻——從陳子昭書割看潮州商人與家鄉的聯繫〉，載於李志賢主編，《海外潮人的移民經驗》，頁 32-54。

61 相關論述參見劉宏，《中國—東南亞學：理論建構·互動模式·個案分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頁 3-39。

表一、近代潮人僑批局創立的數量統計

地區 \ 年代	1910前	1910年代	1920年代	1930年代	1940年代	共計
新加坡	9	15	37	33	53	147
馬來亞	1	12	33	43	85	174
泰國	19	17	47	52	109	244
汕頭	8	16	43	29	8	104
汕頭以外之潮屬地區	14	72	57	24	19	186
共計	51	132	217	181	274	855

資料來源：廣東省檔案館藏汕頭市郵局檔案，全宗號86，目錄1，卷344，「中華民國25年各批局聲請書副份」中各批局及其分號的開設時間；廣東省郵政管理局檔案，全宗號29，目錄2，卷382；鄒金盛，《潮幫批信局》，頁116-715。

表二、1940年潮汕地區村鎮通郵情況統計

縣 份	通郵村鎮數	不通郵村鎮數	不通郵村鎮百分比（%）
潮安	79	602	88.4
潮陽	48	282	85.5
揭陽	85	161	65.4
揭西	33	373	91.9
饒平	22	571	96.3
普寧	27	130	82.8
澄海	43	143	76.9
惠來	7	333	97.9
共計	344	2595	平均：88.3

資料來源：廣東省郵政管理局檔案，全宗號29，目錄1，卷275，頁10-37，〈汕頭分發局地名表〉。本文按當代行政區劃，將原表中的地名劃歸不同縣份。

表三、1948年汕頭僑批局在國內外分號統計

廣東內地				國外及港澳							
地區		分號	地區		分號	地區		分號	地區		分號
潮 安	縣城	20	饒 平	黃岡	7	馬 來 亞	柔佛新山	9	印 尼	勿里洞	1
	庵埠	1		洪洲	3		柔佛士乃	2		望加錫	1
	鳳凰	1		浮山	4		柔佛古樓	1		日里	4
	浮洋	4		店市	4		柔佛居鑾	1		仙達	4
	意溪	1		隆都	4		馬六甲	6		民禮	1
	葫蘆市	1		司馬委	1		吉蘭丹	1		邦加	1
	金石	1		小東	1		吉隆坡	9		廖內	1
	松下	1		其它	3		丁加奴	2		坤甸	29
普 寧	共計	30	揭 陽	共計	27		美里坡	1	安 南	山口羊	3
	流沙	5		縣城	11		霹靂州	5		棉蘭	14
	南山	2		炮臺	1		太平	1		巴達維亞	7
	鯉湖	1		梅兜	1		金寶	1		三寶壟	2
	大長隴	1		河婆	7		怡保	10		萬隆	1
	其它	3		棉湖	4		芙蓉	5		共計	69
澄 海	共計	12	潮 陽	共計	24		檳榔嶼	16	泰 國	擺草	3
	縣城	7		縣城	6		山打根	4		安順	2
	東隴	5		達濠	3		沙撈越	6		金塔	4
	蓮陽	8		陳店	1		沙巴門湖	1		宅郡	2
	東里	4		成田	8		古晉	2		堤岸	18
	樟林	3		關埠	1		峇眼	2		其它	4
	北灣	1		金甌	3		奇砂蘭	1		共計	33
	圖濠鄉	1		共計	22		勞勿	1	香 港 新 加 坡	曼谷	87
豐 順	鮀浦市	1	惠 來	葵潭	3	緬 甸	吉礁	1		其它	2
	共計	30		隆江	1		共計	88		共計	89
	溜隍	5		梅林	2		仰光	8	香 港 新 加 坡		32
汕 頭	湯坑	4		其它	2		共計	8			63
	共計	9		共計	8						
總計		78				總計			3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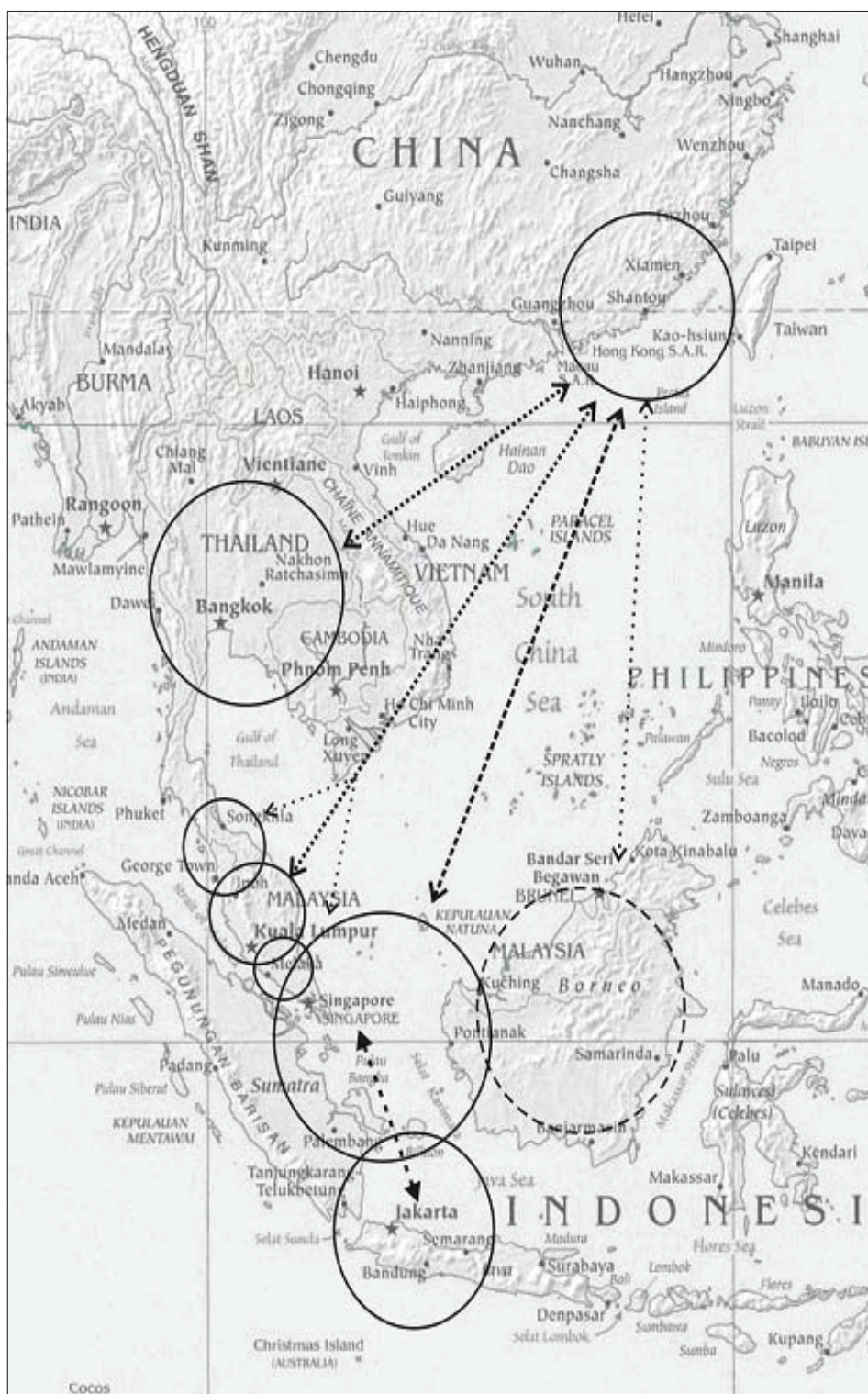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廣東省郵政管理局檔案，全宗號29，目錄2，卷382。

表四、1936年部份家族批局的跨國網絡

批局名稱	分號名稱	開設日期	開設地點	負責人	年齡	籍貫
洪萬豐		民國十九年	汕頭海平路	洪賢良	28	棉湖
	洪萬興	民國十五年	棉湖	洪賢明	28	棉湖
	洪萬成	民國廿三年	新加坡奉教街	洪賢炎	36	揭陽
	中興發	民國十九年	暹羅越三振	洪監澄	50	揭陽
	洪萬祥	民國廿三年	檳榔嶼中街	洪哲生	29	揭陽
	萬成興	民國廿三年	安南美萩街	洪夢矛	30	揭陽
	洪協和	民國十年	河婆	洪士力	62	揭陽
	鴻茂盛	民國四年	黃岡	盧湘如	50	潮安
	萬興昌	民國十三年	店仔頭	許文謙	52	饒平
	光益莊	民國元年	潮安	鍾少岩	58	潮安
	光德成	民國二年	揭陽	李運祥	43	揭陽
	劉喜合	民國元年	潮陽	劉竹船	49	潮陽
	如陶	民國元年	潮安	蔡若水	52	潮安
	普通	民國元年	潮安	吳彩堂	50	潮安
	恒亨	民國元年	留隍	詹集秉	27	饒平
振盛興		民國前三年	汕頭永和街35號	曾國聲	63	澄海
	振盛興	民國前三年	圖濠鄉	曾國聲	63	澄海
	普通	民國元年	潮安	吳彩堂	49	潮安
	劉喜合	民國元年	潮陽	劉竹船	49	潮陽
	瑞記	民國元年	留隍	鄭新南	55	留隍
	魏啓峰	民國元年	揭陽	魏啓圃	35	揭陽
	瑞孚陶記	民國廿三年	黃岡	余桂生	45	黃岡
協成興		民國十一年	汕頭永平路	許漢平	27	饒平
	協成興	民國十一年	曼谷三娉街	許經緯	52	饒平
	協成興	民國十一年	東隴	徐錫河	29	澄海
	陶合號	民國五年	黃岡	許獻其	35	饒平
	信成莊	民國十一年	蓮陽	余昌期	55	澄海
	聚豐莊	民國十二年	潮安	朱湘蘭	37	潮安
	廣順莊	民國四年	店仔頭	金振忠	39	饒平
	廣源莊	民國六年	詔安	許風聲	55	詔安
	魏啓峰	民國七年	揭陽	魏啓圃	35	揭陽
	劉喜合	民國四年	潮陽	劉竹船	50	潮陽
啓峰棧		民國元年	汕頭永興街123號	魏啓和	42	揭陽
	啓峰	民國元年	揭陽	魏啓圃	35	揭陽
	新峰棧	民國二十年	新加坡新巴虱	魏茂中	28	揭陽
	聚豐	民國十二年	潮安	朱湘蘭	28	潮安
	喜合	民國元年	潮陽	劉竹船	48	潮陽
	茂利	民國十三年	黃岡	黃子厚	43	黃岡
	信成	民國十一年	蓮陽	余斯耀	55	蓮陽
	有信	民國十年	澄海	芮弼卿	50	澄海
	永豐發	民國十八年	安南金塔安寧街	林君正	48	揭陽
	陳德華	民國元年	暹羅攀德素旺	陳成煌	37	揭陽
	政記	民國元年	棉湖	楊壁榮	25	棉湖
	李同春	民國十二年	坤甸遠和街	李春樹	37	揭陽
	源合興	民國十年	坤甸綿興街	許雙順	41	揭陽

資料來源：廣東省檔案館藏汕頭市郵局檔案，全宗號86，目錄1，卷344。

圖一、東南亞—華南僑批局網絡的分佈與流通



The Arteries of Chinese 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

A Study of the Teochew (Chaozhou) Remittance House Networks, 1911-1949

Chen Liyu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bstract

Guided by recent theoretical formulations of transnationalism, 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societies comprised by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ir hometowns in South China during the Republican era as an organic whole embodying multiple interactions. Chinese remittance house networks were the primary arteries connecting communities. By studying the form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mittance house networks in the Teochew (Chaozhou) communit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echanisms of interaction among the Chinese 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 scattered in Southeast Asia and South China. Based upon a wide range of primary data as well as field research in South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this paper first provides a survey of the remittance house networks that were embedded in the Chinese socio-economic structure. Then, by investigating the connections of various remittance houses across the South China Sea, I argue that the transnational remittance house networks were linked by multiple levels of sub-networks. Finally, I analyze how family networks, partnership and geo-consanguineous connections we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formation and operation of the transnational remittance house networks. It is hoped that this paper will contribut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nner workings of overseas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 and the complex ties between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and their hometowns.

Keywords: Chinese transnational community, remittance house, business network, Teochew community, overseas Chinese remittance